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书店

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 财富分配原理的 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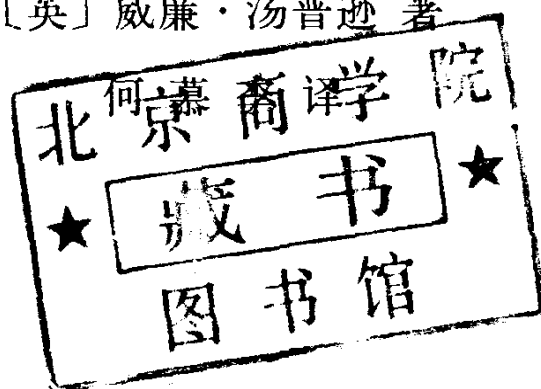
〔英〕威廉·汤普逊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
财富分配原理的
研究

[英] 威廉·汤普逊 著



北京商学院 09919390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最能促进人类
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

[英] 威廉·汤普逊 著
何慕李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374-2/F·296

1986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326千
印数 5 000册 印张 15 3/8 插页 4
(60克纸本) 定价:18.00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2033/1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年10月

原编者序

从本书第一册问世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当时,它可以说是一部在出版前就已寿终正寝的著作。那个时候,人们在思想上还没有接受书中这些先进学说的准备。当时人们一般都认为(现在仍然这样想),对“最能增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则”进行探讨,并不是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那一类作者的任务^①。他们的研究目光还完全没有达到如此通情达理、如此远大和崇高的地步。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财富或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大量积累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幸福问题仅居于次要地位。他们只满足于揭示那些曾经支配或者现在还在支配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法则——也就是说,曾经维持或者现在还在维持着暴力和欺骗王国的那些法则;因为迄今以来,人们生产、交换和消费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享用品和奢侈品,一直是处于暴力或欺骗、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影响之下的。固然,经济学家们有时也大胆鼓吹一番,主张消除一些不利于他们所说的“财富自由发展”的障碍,以改善社会生产事业的经营方式,诸如取消直接规定的或者由于颁布某些财政法令而引起的垄断、奖励、禁令和限制等等。但是,只要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

^① 前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西尼尔先生说:“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我所要研究的不是幸福而是财富;我不但有理由省略,而且也许必须省略掉一切与财富无关的考虑。”

根据错误而邪恶的“个人竞争”原则——孤立和互相敌对的原则——进行的，他们所夸耀的这些改善就无异于天平上的灰尘，丝毫不起作用。只要这种主要的罪恶——这种野蛮的本质——存在一天，人类的生活状况就休想有什么重大的改善。试看在被认为最文明的国家里，这种罪恶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对于群众说来，是无休止的从事着消耗生命的沉重劳动，而所得到的却是连最普遍的生活必需品也感到不足的供给、极端的愚昧无知和不得已的犯罪行为。当他们在时常再现的农业或商业萧条中陷于失业时，他们就只能在济贫院、监狱和坟墓当中选择一条道路^①。

对于中等阶级来说，个人竞争的社会制度使他们不得不长年

① 可尊敬的西德尼·戈多尔芬·奥斯本牧师在 1848 年 6 月 2 日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说：“劳动者一直处于无知状态，对一切社会享受或者勤勤恳恳的独立谋生都抱着低级动物的漠然态度；他们已经如此长期地处于这种状态，以致我们必须用巨大的和耐心的努力才能唤醒他们，使他们离开家乡去寻求公平待遇，而不困居于定居法强迫他们居留的地方，不困居于那些人口充塞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能摆脱的环境滋生着罪恶，他们的劳动价值则为他们无力抗拒的原因所贬低。

“长期而痛苦的经验使我相信，用自己的血汗勉强换一口饭吃的人所处的地位，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他的家乡——英国、快乐的英国(?)、基督教的英国(?)、工业策源地、博爱主义温床(?)的英国——更坏。根据我最近的、时间非常近的亲身经验，根据我从远近各处我可以信任的人们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根据我所认识到的和得自绝对可靠来源的事实，一切都使我相信，在我国成百成千的乡村中，人民的社会状况低于我在书上所曾读到过的任何国家的乡村状况；罪恶的增加之快和性质之严重真该为我们招来任何最可怕的天谴；劳动者被骗去工资、被压迫、被虐待的种种情况对于我们国家的声誉来说真是一种耻辱。

“假使政府能听从谗言，愿意勇敢而开明地努力帮助那些打算去澳大利亚的家庭，我能够指出不止一处需要它注意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如果政府能给予这种帮助，对于自爱和愿意勤劳工作的劳动者就将是一种莫大的恩惠。这将不仅使他们在世界上有了希望，而且能让他们使自己的家庭脱离宗教史与世俗史上所从未有过的罪恶渊薮(我随时可以这样证明)。”

奔走,焦心劳神,经常在最窘迫的经济情况下为维持“体面”而拚命挣扎。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对他们的知识和道德品质,我们能指望些什么呢?这些东西已经被伤心地压抑下去了。一切慷慨的和高尚的情操,都为竞争中的讨价还价——永远想贱买贵卖——造成的狡猾自私的卑劣心理所代替了。

在那些财富最多的上层阶级中间,现存制度的影响表现为他们经常有一种不安全感,经常担心政府会发生剧烈变化,从而造成即使不是财产上的、也是权势上的损失。此外,出身高贵、地位显赫的旧贵族对于只是以金钱取胜的新贵族——中等阶级的百万富翁,也怀有一种病态的嫉妒心理。

这就是现存制度对于通常构成“社会”的三大阶级的影响。把它叫作“社会”,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因为它并不是许多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在一起,而是一个利用彼此的无知和无助状态而互相欺诈的离奇集合体。它不是一种明智的、科学的协作,而是一种粗暴的、笨拙的聚集——不是象被强大的化学亲和力聚到一起的许多原子那样,构成一个有规则的谐和体,而是象一些被机械力强拉在一起、互相排斥的粒子那样,形成一个无组织和不调和的聚合物——总之,用一位当代知名作家简洁有力的话来说,它不是秩序,而是“无政府状态加上一个街道警察”。

但是,为什么人们要容忍这种局面呢?是不是说,以我们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还不能作出周到的安排,实现一种使所有的人都利害相关、祸福与共的合理社会制度呢?是不是还缺少生产手段——假定它们组织得很好的话——能够为所有的人生产出极其富裕的财富(也就是生活必需品,享用品和奢侈品),并使人们有足够的闲

暇时间来高度培养自己的才智和道德品质、养成最高尚的习惯和趣味呢？任何自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略具知识的人都不能否认，不管过去是什么情况，以目前世界上各个文明国家的情况而论，在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给它们的巨大帮助之下，它们完全有条件在物质财富方面充分满足本国人民的合理需要。而且在做到这一点时，还不必象现在生产不充足的供应品时那样痛苦，那样不断的劳累、焦虑，以及在其他种种不愉快的情形下工作；事实上，它所需要的只是在愉快的条件下进行适量的劳动，而这种劳动正是一个人保持健康和充沛的智力、体力和精神面貌所必需的。在最近半世纪期间，这种生产手段的巨大增长已经达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而人们或许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富有发明和改进的匠心。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苦恼，不是我们不能创造出足够的财富，而是在创造出财富之后，由于恶劣的人为制度，不能对它们进行有益于资本家的处理，结果使生产者陷于失业，流于饥寒或窃盗，或者漂泊到地球的另一面去，而不能作出合理的安排，使他们为自己的福利而生产、消费和交换他们的剩余生产品。社会正在极其愚昧地花很大力量救济贫民和惩治罪犯，而利用这些力量却可以绰绰有余地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能够短时期内逐步而完全有把握地消灭贫穷和犯罪（通过消灭造成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并且能够使所有的阶级都过一种比以前任何一个阶级所曾享受过的处境要好得多的生活。

我们再说一遍，任何一个彻底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我们有力量——如果把它们很好地组织起来——既生产出丰富的物质财富，而同时又能使全体人民有充分的闲暇和机会来养

成优良的习惯和作风,获得最有用和最有意思的知识,培养和享受最高尚的趣味——总而言之,成为有高度才智、德行和幸福的人。

但是,我希望谁也不要认为,不对现存社会的各种原则和实践作一次彻底的革命,就能达到这样美好的境界,不过,这种革命将在有关各方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和平而有秩序地进行,因为暴力是和未来的新制度准备用以指导生活的精神完全相抵触的。

社会改良家坚信一条颠扑不破的救世真理,这就是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任何情况下,在一个人一生中的任何时期,人的性格都是由他的身体本性和外在环境(大部分是他所能控制的)对于他的身体本性所起的影响形成的。所以,社会改良家对于一切人的信念、感情和(出于必然的)行为都怀有极其深厚的同情,因此,他经常不懈的努力目标,就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消灭掉那些造成弊害的外部环境,而完全代之以对人类有益的环境。他摒弃一切强力的谬想,因为那些东西无助于他的神圣事业。他用真理武装起自己,挺身而出和错误展开斗争,只是依靠道义上的劝告和仁爱精神,把它们当作能够实现这样一种如此光荣和神圣的革命的唯手段①。

① “他们(社会改良家)习惯于把人类的一切事务都视作一种演进过程,所以既不冒进,也不停顿。指导他们的并不是那种模糊的政治认识,就象熹微的晨光那样,只能照亮他们勉强向前迈步,而是他们愈向前进,境界就愈趋开朗,花花世界,景象万千,听凭他们海阔天空地一往直前。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具有冷静和坚毅的特征。他们相信罪恶并非根源于人而是根源于周围的环境,不是出自人们的本心,而是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够,所以他们对任何人都不绝望。为了消除恶德,培养善行,他们不愿用高压的皮鞭玷污自己的双手,而是从改变环境上来消除诱惑,从加强理智上来战胜诱惑。”——科尔里奇*。

* 塞·特·科尔里奇(1772—1834年),英国诗人,反动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

我希望我在这里简单介绍的这部杰出著作，能够帮助加速这样一种美好的改革。虽然是为了实现一切人的幸福，这种改革必定是普遍性的，它却可以逐步进行——从一切国家中最需要这种改革的那一部分人，即身体健全的穷人身上开始。

令人高兴的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有名的“实业钜子”——正在一天比一天增多，也一天比一天更认真。本书的编者在它最初出版时，就深知在它所论述的重大题目上，这部著作是如何有助于人们形成编者自认为是正确的信念，因此他希望别人也能同样从中得益。为了尽量方便读者，编者在这一版把原书缩减了三分之一左右，并且相信不会因此对原书的价值有重大的损害。

毫无疑问，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将会欢迎本书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因为这些部分为他们的各种孤立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例如，作者大胆揭露了奴隶制度的罪恶，揭露了它在财富生产和传播人类幸福上的成就显然不如自由劳动所起的作用大，这自然会引引起反奴运动拥护者的重视；又如，作者在第一章第十二节中讨论了“自愿交换”问题，对于摆脱了一切津贴和禁令、鼓励和限制、不受任何束缚的“自愿交换”制度的优越性作了精湛的说明，这当然会为“自由贸易派”所乐意接受。主张不分宗派实行普及教育制度的人，也一定会十分欣赏第四章中的透彻论断——论“知识的获得和传播是提高生产和增加享受以及使分配的自然法则获得巩固的一种手段”，特别是论述在成年以前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的第四节。

作为孤立的各个部分来看，这些无疑都是最好的文章，但我们要向读者指出的是，在我们看来是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的那些主要

优点，这些优点可以简述如下：

第一，清晰而合乎逻辑地规定了若干重大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为谋求人类最大幸福，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所必须遵守的。

第二，说明了在个人竞争制度下，这些原则能实行到什么程度以及能取得多大成就，并指出由于这个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弊害，就是在最自由和最良好的形式之下，要实行这些原则也必将归于失败。

第三，说明了在生产上实行互助合作，在财富和享受资料的分配上实行自愿平等这种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指出这种制度不仅在财富方面而且在其他每一种幸福来源方面，都远远优越于迄今存在过的任何社会制度。

第四，说明了这样一点：只要社会上已经积累起的资本就会被用来破坏分配的自然法则，剥夺生产者享用其劳动产品的权利；所以，在财富分配的问题上，明智和博爱的伟大目标应该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成为资本家兼劳动者，成为共同幸福的贡献者，并且为此设想出一种安排，在这种安排下，既可以顺利实现上述伟大目标，又尽可能不给任何人带来不便——这不仅对于已经积累起的资本所有者是如此，而且对于那些目前只是生产劳动者的负担同时对他们自己也很少有好处的游手好闲者也是如此。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

“不管人们设想这种伟大改革会带来什么不便，和它所造成的福利相比，这些不便是算不了什么的。不论是什么政治变革，只是

在具有实现这一伟大改革的明显趋向时，它们才是有益的。本可以不堕落而堕落了的人类——没有知识、没有安慰、没有相互关心的群众——向正义要求这一改革，而从那些自认为是特权阶级的人们的真正利益来看，几乎也同样要求有这种改革。”

在结束时，略说几句关于作者本人的话。汤普逊先生是爱尔兰人，秉性宽厚、仁慈，心胸开阔，而又特别勤学。他一生中有一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政治、道德和社会哲学，其中有几年曾从学于有名的杰里米·边沁^①，并和边沁住在一起。除了写成于1822年左右的这本著作外，汤普逊先生还写了很多和本书性质相类似的作品，其中的主要几种曾以下列书名出版：

《人类一半(妇女)为反对人类另一半(男人)使她们在政治上、从而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屈居奴隶地位而发出的呼吁——对米尔斯先生的名著《政府论》中一段话的答复》，伦敦郎曼图书公司，1825年版。

《有报酬的劳动。劳资权利的协调，或怎样使劳动者得到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伦敦亨特—克拉克图书公司，1827年版。

《根据互助合作、共同占有、平等劳动和平等分配生活享受资料各原则，迅速而经济地建立公社的具体建议》，伦敦斯特兰奇公司，1830年版。

作者对于他的信仰抱着真正热诚的信念，对于人类具有慈爱

^① 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

的精神，这一点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上得到证明：他在 1830 年立了一份遗嘱，把他的大部分财产——他在科克郡的世袭地产——交给遗嘱执行人(编者是其中之一)，用以进一步宣传他如此长期和如此有力地鼓吹过的原则，并帮助较贫苦阶级根据这些原则从事的任何实际活动。

在他立这份遗嘱的时候，公众对于尸体解剖正存在着一种最强烈的偏见。除了靠偷来的尸体以外，我们的解剖学校就只能使用被处决的罪犯尸体。汤普逊先生感觉到这是一种极大的社会弊端，所以在他的遗嘱中插入这样一段：

“为了活人的利益对于没有感觉的尸体进行解剖检查，是一项造福于人的工作，而且对于解剖者说来，这是不愉快的并且往往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人们对此却怀有愚昧的、并且时常是十分有害的偏见。为了克服这种偏见，我决定在我去世后，把我的尸身捐赠给一位解剖学讲师进行解剖检查，条件是解剖者必须把骨骼以原有的或者整理过的形式交给人种与比较解剖学博物馆保存，——正如我的藏书等遗物交给不列颠或爱尔兰第一个成立的合作公社图书馆保存一样。”

汤普逊先生于 1833 年 3 月 28 日在科克郡罗塞伯利地方克罗恩金自己的家中，因肺炎病故。他在逝世前二十年中就一直素食戒酒，据他告诉编者说，他所以这样节制自己，主要是因为慎重地考虑到他的身体在这些方面的需要，同时也因为这样可以使他更好地从事思想探索和著作活动。他的患病时间很短，可是他敏锐地预感到了自己行将去世，所以在死前几天里，能够由于这种预感而

有所准备；他写信给他的几个朋友，就他长期来所关心的伟大事业作出了种种安排。关于解剖他的尸身问题，按照他的遗嘱执行了，虽然并不是没有遭到邻近无知农民相当激烈的反对——几乎激烈到动武的程度。可是他的遗嘱执行人却没有能办到遗嘱中提示的其他各点。死者的一些亲属对于遗产的处理问题提出了争议，于是引起诉讼，案件送到了办事最拖沓、花钱最多的法庭——爱尔兰最高法院里，直到现在还未解决。

写于都柏林郡的克郎塔夫

1850年8月

作者前言

迄今以来，一切考察、研究政治经济学及其有关各学科并在这一方面有所著述的人，都可以被分为两派——精神学派和机械学派。就晚近时期我国的情况而论，在精神学派的玄学家或哲学家当中，突出的人物是《政治正义论》的作者葛德文先生^①。在机械学派的理论家当中，同样有名的是马尔萨斯先生，特别是他的早期著作《人口论》几乎已经成为一派政治经济学家的教科书。

精神学派的玄学家们，由于他们切身体会到同情心和文化素养带来的那种永不枯竭的，令人感到满足的和高尚的喜悦，由于他们本身的物质需求全都得到了愉快的满足，从而使这些方面很少引起他们的注意，由于他们感觉到自己能够自我克制，压抑在他们看来是我们天性中比较粗鄙的那些癖好，或许还由于他们很少注意研究自然界的物质规律、研究人及其周围各种生物的物质本性，——由于这一切，所以他们宣称人只要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差不多不必凭借物质的从属作用，就能够得到幸福。他们把人体组织的思维部分提到了如此优越的高度，以至认为人们今后如果能充分发挥思想的作用，就可以不必依赖通常用来促进健康的物质手段，而纯凭意志力量保持自己的健康。他们认为心灵不用物

^① 威廉·葛德文(1756—1836年)，英国急进作家，他的代表作《政治正义论》对资产阶级贵族的剥削所有制进行了批判，但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译者

质手段作为中间媒介，就可以支配象耕地和航海这类机械行动。至于这种神秘的过程，这种意志的奇迹怎么有可能实现，怎么能和人所公认的事理相符合，当然是无法解释的。

不论人类在谋求社会幸福的技术上可能有什么进展，这些都要归功于他们对周围物质世界和他们自身的广泛了解和细致认识，归功于对这类物质存在的明智的利用、分配和制约。但是，属于精神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们，却希望人的思想就是一切，他们自命不凡地把劳动看成是机械的和下贱的事情，忽略了功利这个最高原则，这个只有根据它才能判断一切事物有无价值的原则。思想是什么呢？不过是人们头脑中产生和被感觉到的活动而已；劳动又是什么呢？劳动就是传达给自然界永远活动着的力量并与这种力量合作的活动。除了比较这两种活动产生人类幸福的趋势大小以外，还有什么标准能衡量哪一种活动更优越呢？

如果说我称之为精神学派的那些玄学家们过于忽视物质和物质力量的作用，那么，我称之为机械学派的那些理论家们，则正好采取了另一个极端。据他们看来，人这种生物根本就没有什么理智力和同情心；他不过是一个机械的东西，就如同他与之合作的耕犁、织机或马匹一样；只有用对其他动物起作用的那些粗暴手段，才能促使他劳动。那些自称为纯政治经济学家，声言除研究财富问题外别无其他目的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一派。他们对于智慧、仁慈、互助合作和可以达到尽美尽善境地的可能性这些崇高的观念，都一律加以嘲笑。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作出这样的安排，使机器——不论是用食物和空气发动的活机器如牛、马、人等，或者是用蒸汽或水来发动的死机器——尽可能多地生产出食物、衣

服、房屋以及各种优雅的或者随心所欲的消遣品等等，另一方面，则是想出各种办法来找到足够的消费者使用生产出来的这些物品，以便每年都能够继续保持对这一类产品的需求。至于这些物品是用什么方法或者由谁生产的，不管是由骆驼、马、人、奴隶或非奴隶生产的，是由沉重的或轻快的、健康的或损耗生命的劳动生产的，这些都无关紧要，除非这些死机器或活机器的耗损将提高价格或减少生产。这些物品是怎样或者是由谁消费的，究竟是由广大的生产者消费、让喜笑颜开的民众普遍得到欢乐呢，还是由住在高楼大厦中的少数人享用、由于过份充足而徒然浪费掉呢，这些也都无关紧要。这一派学者所关心的，只是怎样达到最高额的生产 and 保证最大的消费或有效需求。除去和财富或交换价值直接有关系的东西以外，这些严峻的经济学家们在推理过程中不考虑任何其他问题。在这些机械学派的理论家中间，正如在精神学派的玄学家中间一样，同一派人的意见又存在着各种差别；他们有时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一些对立学派的观点。

以上这两派研究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幸福问题的理论家（他们被作者称为精神学派和机械学派），没有一派能达到真理；不论哪一派都还没有设计出一种调和而有益的人类劳动制度，提出一种最明智、最健全的产品分配方法；虽然每一派在自己这方面都发现了不少真理，揭露对方的错误却是他们的主要快事。这一切难道有什么奇怪吗？他们怎么会不是这样呢？事实是，人并非仅仅是一架机器，就象一架蒸汽机或纺纱机那样，也并非一头愚蠢的牲畜，就如同供人驱使的牛马一般。同样，人也不仅仅是一个纯思想的东西，同他周围的生物和无生物没有任何共性。人是一种非常

复杂的生物。就和他的工作对象木材或羊毛一样，他同样会受到外物推动力的影响。适当的动因可以使他的身体内部和外部产生化学的和机械的变化，正如在其他物体身上所产生的一样。山洪和狂飚那种压倒一切的力量，会一视同仁地把他和一切无生命的障碍物（不管是他搭起来保护自己的棚屋，还是他当作救命物抓住的木板）一齐冲倒，按着每一件东西的不同重量和抵抗力把它们卷走。在这种场合，由人们的身体组织产生的、发展成为神经和肌肉活动的某种生命力，只能使人增加很少的抵抗力。和一切别的动物一样，人只能在不断得到空气和食物刺激的条件下生存下去；和组织得最完善的动物一样，由于身体各部分的所谓感官中存在着各种神经末梢，人能感受到各种快感和痛苦；和那些动物一样，人也会产生某些由内分泌引起的、完全不受他的意志支配的冲动，从而具有某些和他的身体组织不可分的癖好、欲望或需要。但是，和那些无生命物质的固体或气体分子不同，和任何我们所知道的除人以外的有生命组织不同，人不仅能从他对周围事物的观察以及这些事物与他自己的关系中得到最大程度的感受，不仅具有记忆的能力，即把他最初观察所得的这些感受永久保持下来的能力，而且还有比较和推理的能力。因此，人能够观察自己的身体组织，有展望未来的目光，会考虑他的活动造成的后果，从而能够既以目前的也以长远的动机来指导自己。通过适当的训练，人能够于感官和内部冲动的快乐之外，感受到得自文化素养的愉快；通过对自己的嗜好和情欲作适当的节制，人不仅能极大地增加对它们的享受，而且可以避免因缺乏预见而造成的弊害，养成和他的同类亲密合作的意愿和同情心。

由此看来，当事情主要涉及这样一种生物的自愿或被迫劳动的时候，难道我们能够象对待羊群或者从它们身上剪下的羊毛那样，象对待空气、水、蒸汽和机器动力那样考虑问题吗？或者说，在主要与这样一种生物有关的事情上，难道我们有理由这样来看问题，好象他完全是由理智和善心组成的，好象他不受那些在他的身体内部和周围起作用的、自然界的化学和物理定律的影响，好象他能够摆脱掉那些随着他的生理发育各阶段而产生的感受和冲动，好象他天生就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用不着借助一般公认的自然作用或动因，只靠意志就能够在他的身体内部和他的周围造成变化，就象诗人笔下创造万物的大自然精神或意志所具有的那种力量一样吗？

所以我认为，要想使政治经济学的高贵发现——从它们本身联系到的东西来看，这些发现也是伟大的——有益于社会科学（如果得到应用，它就能成为造福社会的手段），就一刻不能忘记人类的复杂性质，他既是一种用来起作用的工具，也是一种受作用的生物。如果不经常考虑到这一点，功利这个指导原则就要被牺牲，而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目标——财富积累或者每年产品的无限增加——就将没有价值，只能使四分之三或十分之九的人类陷于痛苦的无偿劳动，而让其余的一小部分人在奢侈浪费中懒惰得要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问题。对于社会说来是如此，对于个人说来也是如此。人要想快乐，便脱离不开享受的物质手段，这在一切文明社会里主要就是财富；但是，人们可以在拥有较少财富的情况下达到前所未见的快乐境地，而在财富极为充裕的情况下，却仍可能

非常痛苦。和社会利害攸关的，主要是财富的使用和分配问题，而不是财富的多寡。因此，在研究财富问题的时候，就有必要不仅从它对于生产和再生产的作用上着眼，而且要考虑到财富的道德和政治效果，考虑到它影响人类幸福的一切方面。

伦理学家们大部分不懂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真理；神学家们只抱着他们自己那些特殊的和有利可图的梦想，摆出一副瞧不起其他一切学问的姿态；政治经济学家则声言他们只注意财富的生产和积累，至于分配问题，除了影响到再生产和积累外，他们是不管的，他们把财富对幸福会发生什么影响的问题推给了伦理学家、政客和政治家，并且认为他们这种脚踏实地的具体理论和虚无缥缈的精神哲学之间有着巨大差别。更有甚于此的是，直到不久以前，化学家和机械师、工业家和商人们也都目空一切，认为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纯粹是空谈，根本不能应用到他们的本行活动上去。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问题并不在于学问的分门别类，这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就象劳动的分工不应该受到谴责一样；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在每一门学问上先集中全力精益求精地研究它那特殊部门，而不应该忙着在社会幸福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应用自己的那一门学问，同时却没有掌握那些同等重要的其他知识（而这些知识，却是正确地应用那门学问所必须依靠的基础）。社会科学是一门伦理科学，立法问题又是其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因此它不仅需要具备用术语来说叫做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那些知识，而且需要大致掌握一切已知的各门学问，有能力深入研究任何一门在特殊的情况下可能有助于实现总目标

的特殊学科。可是上面谈到的那些理论家们，没有一个人把自己限制在他们的本部门之内，而是在并未具备有关知识的情况下，就大胆地把他们那些孤立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上来。当然，这方面也有几个光辉的例外，其中有一位思想家对于伦理科学的贡献，比培根^①对于自然科学的贡献还要大；因为培根只是指出了一条通向科学发现的新的可靠道路，而这位思想家^②则不仅指出了从事伦理学研究的正确道路，并且亲自在这方面作出了前人没有想到、当然更谈不到完成的巨大进展。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循着他所指出的道路，把政治经济学上确定了的原理应用到社会科学上，使这些原理和所有其他各部门学问为最能增进人类幸福的财富的公平分配服务。

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几乎每一个时代，人们都模糊地看到和认识到了一切人获得平等享受的利益和财富极端不平等的巨大弊害，并且在争取建立公平的分配上作了一些徒劳无益和愚昧无知的努力。强力一直是出于无知而用以实现一切事情、甚至用以实现正义本身的手段，所以，人们也曾凭借强力来建立平等。但是，一经使用强力，保障就不存在了，随着保障的不存在也就没有了生产，结果也就失去了获得幸福的手段。所以，人类就陷进了一种残酷的进退两难的处境。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的伦理学难题，“怎样调和平等和保障，公平分配和不断生产”。本书的目的也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探讨它的后果，并指出用哪些公正

① 弗·培根(1561—1626年)，英国哲学家，其《新工具》一书对于科学方法论作了杰出的阐述。——译者

② 从作者的思想体系和曾经受业于边沁的历史来看，这里多半指的是边沁这位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译者

而温和的手段可以使分配的自然法则被普遍采用，可以使保障被公平地适用于一切人，而非独占地和伪善地仅仅适用于少数人，从而使它成为实现合理和健康的平等时最坚强的保证，而不致成为实现这种平等的永久障碍，因为唯有存在着保障才是不断再生产和财富积累的稳固基础。

直到今天，这个重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试图解决它。对于少数思想开明的人来说，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需的初步原则可能是他们所熟悉的，但他们并没有一个人担负起这样一种任务，即把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散的知识集中起来，整个应用到财富分配问题上。因此，把社会科学的这一个部门获得的知识加以推广，并由推广应用到实践上；把全体人类都应该懂得和实践的这些重要真理，从冥思默想的研究家的安静书斋里（这些真理曾经在那里使少数人的心灵感受过喜悦和激动）引导到生活和行动的现实中；帮助拭净科学身上的污痕（孔多塞^①在三十年前已经注意到这种污痕，但是它们迄今还沾染在科学身上，所以科学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光荣，却没有或者很少给人类带来幸福）——这些就是我迫切希望达到的目的。

今天，看一看文明人类的现状，谁能不高兴呢？^②看到真正的知识已经普及的情况随时随地都在表现出来，谁能不高兴呢？看到人类的一切文明国家，不是正在按照他们本身的知识水平稳定地改组他们的社会制度，就是即将展开那种必然要进行的伟大的

^① 孔多塞(1743—1794年)，法国启蒙学者、社会学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著有《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况》等。——译者

^② 写这句话时是在1822年。——原编者

博施济众的活动,谁能不高兴呢?现在谁还看不到:不论一个社会拥有的知识或财富的绝对量是多是少,构成这个社会幸福的并不是它们的丰富与否,而是它们的正当使用和分配呢?因此,难道现在不正是恰当的时机,正好让我们以坚持不懈的精神来研究分配的自然法则,弄清楚立法机关和个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有益地配合事物的这些发展趋势,从而使新社会组织摆脱掉那些由长期的愚昧造成的、根深蒂固的罪恶和贫困本源吗?

但是,如果由一切文明国家构成的整个世界的状况,以及我们(这些国家里边的人)对于事变的总进程的关心,还不足以唤醒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种近在眼前的、就在我们身边的情况,使我们不能不立即注意到财富的分配。为什么一个国家拥有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的自然资源、机器、住宅、食物以及勤劳智慧的生产者,具有可以获得幸福的一切显而易见的手段,并且存在着由社会上一小部分富有者表现出来的类似幸福的景象,而竟然穷困不堪呢?为什么人们经过成年累月不断的和有效的努力之后,辛勤劳动所得的果实,竟在他们本身既没有胡作非为、自然界也没有发生灾害的情况下,会被神秘地全部夺走呢?这不是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不是由于缺乏足以使一切人都能过舒适生活的物质财富,也不是由于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去进行更多的再生产。那么,人类事务中的这种奇怪变态,这种置身于一切幸福来源之中而终不免于贫困的情况,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懂得生产方法和不愿意劳动的野蛮民族会陷于贫乏,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发达的技术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竞相造福于人的情况下,千百万勤劳智慧的人民竟不能享受他们自己

创造出的产品，这才是一件神秘难解的事，一种使人惊异的现象。这种特殊的现象如果不是由财富分配的不得当造成的，那又是因为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对不公平现象发出抗议的呼声不是最自然的吗？要求用强硬的干涉手段来纠正这种不公平，不是最自然和最平常的么？找出这种分配不当的原因，不是非常有必要的么？它们到底是临时性的呢，还是根深蒂固和永久性的呢？目前这种现象究竟是表示那些长期存在的错误和极端有害的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已经发展到最高峰，因而现在到了大肆破坏，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呢，还是代表着别的什么呢？是不是能在强力以外找到任何一种人为的或自然的办法，使同样的灾祸不可能再发生，并取消目前这种会产生众所周知的那些弊害的分配方法，而代之以一种有益于一切人，并且能够自动调节和自我保存的分配制度呢？难道研究这些问题不是最有必要的么？要想作根本治疗而不是仅仅作局部的临时补救，还能够有任何研究比这更为迫切吗？

目前的财富分配状况趋向于牺牲广大生产者的利益使少数人致富，使穷人陷入更绝望的贫困深渊，使中等阶级沦落进穷人的队伍，以便让少数人不仅能够把真正的国家（它不过是个人的集合体）资本有害地大量积聚在自己手里，而且能够由于这种积聚而支配社会每年的劳动产品。看到大多数人都日趋贫困，而少数人却日益穷奢极欲、愈来愈富，谁能不深感忧虑呢？谁看不到这样的后果，即如果不依靠自然的分配原则或者其他办法来遏止这种发展趋势，它就会逐渐破坏国家的富源并使劳动者的生产情绪日趋低落呢？难道我们现在还不该问一问，是不是根据自然和社会的法则，我们注定要忍受这类现存的和可以预见的弊病，而假如我们企

图冒昧地消除这些弊病，就会有遭受更大痛苦的危险呢？所以，目前一切道德的和政治的智慧都应该主要致力于解决这一症结问题，即获得幸福的物质资料的公平分配，因为——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不事先作出安排，使新西兰的野蛮人不仅能获得生存资料，而且能获得生活享受资料（即使不是由我们赠送，至少也应该由他们通过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力而获得），而只是向他们宣扬各种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要他们用这些东西来控制自己的欲望，那将多么没有意义！正是在这些物质资料的使用和分配过程当中，他们的优劣品质，他们的美德或恶行才得到了主要的发展。技巧和坚忍耐劳是生产财富、也就是生活享受资料所必需的条件。守信或虚伪能够帮助人们通过交换或其他方式取得财富。诚实表现在对他人所有物的尊敬上，强暴与残忍则通过掠夺生产者的所有物表现出来；谨慎和有节制表现为如此支配所有物，以便既能得到它们所能产生的一切目前享受，又不至于招来可能有的将来祸患（如果盲目地服从本能的支配，就一定会贻留下这些祸患）。仁慈就是在智慧的指导下，为可贵的同情心所驱使，使财富能对于别人的幸福有所贡献。由此可见，我们最重要的善行和恶德都是这样不可分割地和财富分配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如果在谈论道德和立法问题时假作清高地轻视财富这类东西，那就是徒作空谈，不务实际，也就是使社会在受苦受难之外又蒙受了伪善或无知的侮辱。

如果我们发现政治经济学所要求的分配方式和政治上的功利观点有冲突，而从一般道德观点来看二者并无轩轻时，我们就要仔细权衡财富和政治的轻重而善为取舍。如果我们发现增加财富和设想的政治上的功利要求一种分配方式，而普遍的道德原则要求

另外一种分配方式时,我们就必须根据增进全民最大幸福的原则,使财富和政治考虑都服从于能保证最大的善行即最大幸福的那种分配。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幸运,能找到一种分配财富的方式,既能最有助于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又比任何其他可能有的分配方式更能促进政治上的功利,既能提供最广泛地传播道德风尚的美好希望,同时又是如此简单易行,以致不需要任何累赘的法律机构,乃至几乎根本不需要任何机构来支持它,那么,我们就应该联合一切公正的人士来推行这种如此优越的分配方式。作者不自量力在本书中所要讨论的,就是这样一种同时具有许多优点的分配方式。

本书所讨论的和加以比较的人类劳动方式有三种:第一,直接或间接的强迫劳动;第二,在不受限制的个人竞争情况下进行的劳动;第三,互助合作的劳动。这三种人类劳动方式的最后一种,也就是互助合作的劳动,在增加生产和保证人类幸福上优于第二种个人竞争的劳动,而第二种又优于第一种强迫劳动。

引起作者通过本书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直接原因是这样的:在科克郡一个为了普及知识而建立的文学协会里,一位擅长在政治经济学问题上进行争论的先生,认为应该大力鼓吹目前存在的财富不平等的好处,宣扬穷人应当明白他们对富人的依赖;从而应当感激富人,以及美国的财富自由和平等太过火了等等。这样一些看法,特别是由这样一个人提出来,使我深感惊讶。因此,我不仅当时对他进行了反驳,并且决定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以论文的形式把它提到社会面前,以备将来更广泛地加以讨论。在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这一问题的重要和范围的广泛,同

时,从书刊上和谈话中可以见到,几乎到处都存在着这方面的混乱和错误看法,这就大大增加了我完成这一工作的热情,决定真理要求我写多长我就写多长。这样一来,原来打算写的论文就扩大成了现在这本书。

目 录

原编者序.....	1
作者前言.....	11
第一章 从我们的本性以及我们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研究一切公平的财富分配应该依据的自然原理、原则或法则	25
第一节 财富是由劳动产生的	29
第二节 分配财富的目的和用劳动来生产财富的目的的一样，就是借此尽可能地给那个生产财富的社会以最大量幸福	39
第三节 社会上所有的成员（畸形的人除外）既然在身体构造上相同，所以在同样的待遇之下都能够享受到同样的幸福	41
第四节 多数人的幸福优先于少数人的幸福	44
第五节 被称为财富的那些生活享受手段或者谋求幸福的手段是在知识的指导之下，把劳动应用到自然所提供的原料上生产出来的，所以必须有足够的刺激，作为动机，使在知识指导下的必要劳动发生作用，从而生产财富	47
第六节 按照自然之理，对于生产的最强有力的刺激（也就是	

- 最大生产所必需的刺激), 是使生产者在完全享用他们的劳动产品上获得“保障”51
- 第七节 财富品的一切自愿交换, 意味着交换的双方均认为换入的物品优于换出的物品, 因而增加幸福, 也就增加了生产财富的动机58
- 第八节 把劳动生产品、财富品和谋求幸福的手段, 从任何个人那里用强力取走68
- 第九节 从任何一定数目的个人手里, 强迫取走许多小部分财富将使幸福的总量减少77
- 第十节 没有一个人的劳动产品, 或者劳动力本身, 或者它们的任何一部分, 应该在没有他认为满意的等价物的情形下从劳动者那里拿走83
- 第十一节 物质财富、劳动生产品的分配应该完成双重目的, 尽最大可能促进享受上的平等和尽最大可能促进生产91
- 第十二节 为了完成这个公平的分配, 在使用劳动上或者在劳动产品的彼此自由交换上, 不应该实行或者支持带有财富性质的, 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奖励或者限制 101
- 第十三节 只有一种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是应该被支持的, 那就是从保障每个人自由使用他的劳动力和自由享用他的劳动产品上以及随之发生的自愿交换上所产生的不平等129
- 第十四节 所有其他种分配上的不平等不仅是不必要的, 而且对于刺激生产是有害的, 所以必须加以制止 135
- 第十五节 劳动生产者在生产时使用的物品叫作资本, 这些物品的所有者叫作资本家, 劳动生产者为了他们所使用的资本应该用他们的多大一部分劳动产品来偿付资

本家	143
第十六节 从上述前提得出来的一般结论	153
第二章 强迫的财富不平等实际造成的弊害	158
第一节 强迫的财富不平等所造成的道德方面的弊害 减少 从财富中得到的总享受量并不增加富有者的幸福 造成富有者的绝对恶行因而带来悲惨的后果, 这些和 其它恶行将被传播到全社会	159
第二节 强迫的财富不平等所造成的经济方面的弊害 每年 的消费是得不到补偿的损失; 推动了最无益的生产事 业的发展	166
第三节 强迫的财富不平等所造成的政治方面的弊害 必然 造成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滥用	174
第三章 分配的自然法则即“自由劳动、完全享用劳动 产品和自愿交换”, 也就是为同样有保障所限制 的平等所带来的利益	183
第一节 从分配的自然法则产生的政治方面的利益 除了代 议制政府制度之外, 这些法则和一切其他制度不相 容 使国家厌倦战争, 但有力量保卫自己 清除最 强有力的犯罪动机 减少政府机关的开支到最低限 度 使一切对于宗教团体的支持成为自愿的	183
第二节 从分配的自然法则产生的经济方面的利益 生产和 资本将得到巨大增加 生产者将组成合股经营的组 织	191
第三节 从分配的自然法则产生的道德方面的利益 富有和 贫穷所产生的特殊罪恶几乎可以完全绝迹 这些原	

则对于“财产权”的影响·····	203
第四章 知识的获得和传播是提高生产和增加享受以及 使分配的自然法则获得巩固的一种手段·····	212
第一节 知识与劳动和财富的关系·····	212
第二节 作为传播知识或者压制知识的手段之一的社会制度以 及这些制度对于财富和幸福的影响·····	216
第三节 传播或压制知识的第二种手段,以成年人为对象的口 头的或书面的教育;发展上的障碍·····	232
第四节 传播知识的第三种手段,成年以前在严格的意义上对 人们进行的教育,教育对于财富和幸福的影响 在大 不列颠和爱尔兰实行普及教育制度所需要的代价·····	245
第五章 现在从无保障的法律制度中产生的财富分配的情 况和怎样把现存的造成不平等分配的强迫手段变成为自 愿的在保障原则限制之下的平等方式·····	261
第一节 用政治权力抽取劳动产品而没有得到生产者或所有 者的同意所造成的一般弊害;这里把这种抽取叫做公 开掠夺,并表明它比私人掠夺的范围更广泛,更难于 纠正,因而也就更有害·····	261
第二节 显然会造成强迫的财富不平等,或者不是同等保障所 要求的不平等的那些特定的法律制度或手段·····	262
第三节 显然会把强迫的财富不平等固定下来的那些特殊制 度或手段·····	263
第四节 显然会既造成强迫的财富的不平等又把它永久化了的 那些特殊制度或手段·····	263
第五节 怎样把现存的强迫造成不平等分配的手段变成为合	

	于分配的自然法则的自愿方式, 以导致只为同等保障 所限制的平等	264
第六章	个人竞争原则和互助合作原则在财富生产与幸福方面的利弊的比较 个人竞争的利益 个人竞争的弊害	266
第七章	财富分配的自愿平等。互助合作的劳动和个人竞争的劳动的对比	281
第一节	财富的自愿平等制度的基本特征	286
第二节	采取互助合作办法的财富的自愿平等制度的利益	291
第三节	自愿平等的制度所不能消除的或者似乎将使之变得更为严重的对于人类进步的障碍	324
第四节	采取互相合作办法的财富的自愿平等制度是否实际可行	330
第五节	对于采取互助合作办法以实现财富的自愿平等制度的一般反对意见的研究 建立在“哲学上的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学说 建立在限制基础之上的实际措施 对于移动和迁居的限制 对于天才和特别努力的限制 对于艺术培养的限制 追求上的和性格上的千篇一律 公社与公社之间将发生竞争 社团统治会侵夺公社的管理权 人口过剩会使这些公社陷于不幸 自愿平等会推翻现在的社会制度 土地肥沃程度不同是对于财富平等制度的自然障碍	375
第六节	财富的平等只有靠理智来建立	434
结束语	437
人名对照表	458